



# 汉语熟语研究的正轨与要务

周 荐

**提 要** 汉语熟语研究在汉语史上有优秀的传统。古人和先贤奠定的研究基业,后之来者踵武而继承之,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熟语遗产,后人认真研究其规律,发掘其内涵,是严肃的学人的责任和使命。而出于标新立异的目的将原本完整统一的学科任性割裂,对学术的良性发展有害无益,也与中国传统上的朴学求真的优秀学风大相乖违。

**关键词** 字 词 熟语 词汇学 词典学

—

汉语中有两大类经组合而成的词汇单位,一类是复字词,一类是语。复字词,此暂不赘;语,又称“熟语”等,它十分复杂,包括谚语、成语、歇后语、惯用语等各种各样的成员。语,短可由一个词与其他成分组成,形制与词约略等同,在句中的语法功能和句法分布等于或约略等于词;长可由若干个词或词语与其他成分组合成,形制大于词,在句中的功用也与词相去稍远。但无论长短,所有的语都属语言建筑材料单位,与其他成分一起构成词汇。从源头上看,汉语先有词后有语,但两者的历史都相当悠久,先秦及后世的典籍中被称作“谣”“谚”“俗语”“俚语”“俗谚”“俚谚”“谣谚”“常语”“常言”或干脆就称作“语”的单位,与“百姓、陛下、缙素、奈何、然则、食客、驷马、天子”这些被后世称作“词”的单位一起,在今天合称为“词语”。各类语产生的历史并不一致。最早被记录下来的语,就是在后世被定名为“谚语”的语。晚于谚语被关注的语是成语。成语,顾名思义,需经历一个“成”的过程,乃为“语”。(周荐 2004)成语是后世的人们看前代的一些语,因其部分出自名人之口或经典性作品,结构齐整,雅而不俗,遂被名为“成语”。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成语化自谚语,而谚语虽多非出自名人之口,却借记载它的著作而传世。这部分成语是将结构不齐整的谚语整齐化,语体通俗的谚语雅化,最终变为成语的。“成语”术语的出现虽然较迟,却也不会晚于宋代(张铁文 1999),但其所指对象在先秦典籍中已大量出现。歇后语这种语和“歇后语”这一术语,都出现于唐,其中的一部分单位因与诗有渊源关系而被称为“歇后诗”,后才因它在口语中普遍使用开来而称“歇后语”。(温端政 1985)惯用语,是语中出现较晚的“语”种,术语在汉语中出现更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汉语术语“惯用语”的出现是否与日语术语“慣用句”有关,也未可知。“惯用语”的术语在汉语中究竟所指为何,迄无定说,目前尚在讨论中。(周荐 2004)上述是人们最常提到的四类语。但是,这并非语的全部,比如过去数十年间曾为一些学者提到的格言、警句、套语、对联、标语和口号,最近几年为人提到的伪语(周荐 2016)、语块(周健 2007),都不能不说也是语的成员。语有很多种,内部差异



巨大。若论起与词最为接近的语,则非成语、仿语、惯用语莫属,它们在作为语言建筑材料单位上与词基本一致,多数可入句而充当句法成分,句法分布也与词大同小异。而谚语、歇后语以及格言、警句、套语、对联、标语和口号、语块等,从是否典型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可否入句而充当句法成分两个角度看,距词稍远,与成语、仿语、惯用语的距离也不小。“词”的语言学术义是最近一百余年才确定下来的(周荐 2017),“语”术语所指究竟为何,似仍在研讨中。<sup>①</sup>词、语之所以常被人们置于一处称为“词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那几种与词形制接近的语也具词感。(胡明扬 1999)

汉语词汇学史上最先引发人们关注的单位是词,不是语。先秦《尔雅》所收,是字和词,很少是语;汉代扬雄《方言》所收,也多是字和词,鲜见语的踪影。大约从中古始,人们才在深入全面认识词的同时,逐渐将目光更多地投放到语上,出现了专门关注语的著作,如唐·李义山《杂纂》;但更多的,还是将字、词、语裒辑在一处的著作,如明·陈士元《俚言解》,清·翟灏《通俗编》。古人之所以将字、词、语裒辑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明了字、词和那部分语,三者虽互有异同,共性远远大于个性。

古人和今人专门裒辑语的工具书,多是对语分门别类作整理和归纳的,如谚语有谚语词典,成语有成语词典,歇后语也有歇后语词典。成语与大部分谚语,成语与歇后语间的差别,比成语与词的差别似乎还要大一些。(周荐 2014)如果一定要将它们裒辑在一起,古人更倾向于将字、词、成语及部分谚语纂成一书。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字与词的关系近,词与成语的关系也不远,成语与部分谚语的关系密切。字与词关系近,似无须多论;词与成语关系不远,从一些成语可有词的简略形式即可看出,如《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守株待兔”和“株守”,“掌上明珠”和“掌上珠”“掌中珠”“掌珠”,都是前者为成语,后者是词,后者由前者简缩而来;成语与部分谚语关系密切,可从相当数量的成语历史上本就是谚语可以看出,如成语“投鼠忌器”源自谚语“欲投鼠而忌器”,成语“唇亡齿寒”来自谚语“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 二

古人对语所作的研究,亦如对字、词的研究,主要的是如下四项:注字音、释词义、溯语源,查书证。现代人承继古人,也对语做了注音、释义、溯源、查证的工作。这其中,从古籍中搜集俗语,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温端政主编《古今俗语集成》(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9),就是一件不错的工作。该书凡六卷,共收俗语 29,689 条,数量不菲。《古今俗语集成》尽管做了诸多努力,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俗语漏收,至为遗憾。该书名为“古今”俗语的“集成”,多少有些勉强。中古的一些口语体的著作,似乎就未引起编者的应有重视。例如晋·干宝《搜神记》一书中就有不少谚语,只“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卷一)一条为《古今俗语集成》收录,下列诸条未见收录:

- (1)长安中谣言曰:“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卷一)
- (2)灵帝之末,京师谣言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卷六)
- (3)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卷六)

晋·葛洪《西京杂记》倒是被《古今俗语集成》提到,但是该书只收《西京杂记》中“苦饥寒,逐金丸”一条俗语,下列俗语却都未留意到:

- (4)弘叹曰:“宁逢恶宾,无逢故人。”(卷一)
- (5)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卷二)

(6)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卷二)

(7)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卷二)

晋·王嘉《拾遗记》末为《古今俗语集成》眷顾，其中的一些俗语自然也就为该书所忽略：

(8)故谣言曰：“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官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卷五)

(9)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卷六)

(10)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日昼星富无匹。”(卷六)

南朝宋·刘敬书《异苑》中的一些俗语，只“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卷四)一条为《古今俗语集成》所收，下面的四条均未为该书收列：

(11)晋时长安谣曰：“秦川城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看。”(卷四)

(12)秦世有谣曰：“秦始皇，何殍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殍吾食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邱当灭亡。”(卷四)

(13)卢龙将寇乱京师，谣言曰：“十丈瓦屋，芦作柱，蕤作栏。”(卷四)

(14)故时人为其歌曰：“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卷四)

《古今俗语集成》是将二十四史列为重要文献的，但是上述俗语，有的就在二十四史中有所著录，却也未为《古今俗语集成》留意到。例如“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竟识其家”一条，就见于《后汉书·逸民传·严光》。近代总集、笔记类著作中的俗语，就更难尽收。例如：

(15)语云：“北方有无雷之国，南方热，有无日不雷之境。”(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天语》)

(16)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曾国藩家书·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17)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郑观应文选·商战下》)

(18)俗语云：“豆腐是水，阎罗是鬼。”(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如果再看佛典和方志类等著作，值得《古今俗语集成》考虑收录的熟语可能就更多，不烦赘举。

现代作品中的俗语，更多如牛毛，实在是无法尽收。举几个例子：

(19)南海先生……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

(沈从文《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20)不这样作，很容易“只见其小，不见其大”，光照了老师的一字一句修改，可能通篇不连贯，失去脉络，弄得支离破碎，非驴非马，既不像自己，又不像老师，把一个曲子搅得一团糟。(傅雷《傅雷家书》(增补本))

(21)我们不知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杨绛《干校六记》)

(22)河北省人嘲笑农民谈吐不文雅，说是“蚂蚱打喷嚏——满嘴的庄稼气”，说的也是蝗虫。(汪曾祺《蚂蚱》)

(23)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有私家汽车。(齐邦媛《巨流河》)

(24)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季羨林《牛棚杂忆》)

(25)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看姣姣。(胡兰成《今生今世》)

上面句中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只见其小，不见其大”“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蚂蚱打喷嚏——满嘴的庄稼气”“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一滴汽油一滴血”，以及“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看姣姣”，就是谣谚、惯用语、歇后语、标语或口号，都可视作俗语，却都未为《古今俗语集成》所收。

除从古籍中搜集俗语这项工作外,温氏还有对熟语研究的另一贡献,那就是在汉语词汇学理论指导下完成,1985年作为“汉语知识丛书”同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歇后语》《谚语》两书。说上两书是在汉语词汇学理论指导下完成的,有下列材料可证:《歇后语》一书,温氏在“歇后语的结构”一节分析“引”“注”时,说有“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连动结构”“兼语结构”“联合结构”“谓补结构”“数量结构”“紧缩结构”“的字结构”等多种。在分析“歇后语的语义”时,说“歇后语的别义……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由后一部分里一个或几个词派生出另一种意义而产生别义。这种由原义派生新义而产生的别义,叫作派生义。派生大体上可分成引申和换喻两种方式。”“第二种情况,利用后一部分里一个或几个字形、音、义上的相关,通过谐音而产生别义,这种情况产生的别义叫作假借义。”“第三种情况,通过后一部分里两个词的配搭产生新词,从而使意义发生转换。这种情况产生的别义,叫作转换义。”谈到歇后语的“附加意义”,他分析说有“形象色彩”“感情色彩”“风格色彩”“阶级色彩”。谈到“歇后语语义的聚合关系”时,他说有“单义歇后语”“多义歇后语”“同义歇后语”“反义歇后语”。《谚语》一书,温氏分析了“谚语的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谚语的单义性和偏义性”“同义谚语和反义谚语”……还需举出更多吗?尽管温氏在两书中绝口不提“词汇”,只用“语汇”字眼,但他所谓的“语汇”,究竟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在什么理论框架下所做的研究,不是非常明白了吗?<sup>②</sup>

一项工作,开一个好头,实属不易;若循此正途继续努力下去,当有值得赞赏的成绩。温氏从古籍中搜集熟语的工作,以及在词汇学理论指导下编著熟语研究性著作的工作,倘能持之以恒努力地做下去,成就自有令人刮目相看处。可惜,温氏此后改弦更张做起了另外两项工作:一是合而分分而合地编了百十部熟语工具书;二是提出“语词分立”的主张,将词汇学割裂,将熟语从词汇学中剥离出去称“语汇”,再拷贝词汇学的系列术语另搞一个“语汇学”,继而提出在“词汇学”“语汇学”之上再建一个“词语学”,将收集语的工具书从词典中独立出来,称“语典”<sup>③</sup>,搞“语典学”……温氏所编的那百十部熟语工具书,学术水平如何,兹不置评,但愿它们都具原创性;对温氏所倡“语汇学”,学界最近几年已开始有人站出来发声,展开学术讨论。(周荐 2010;刘静静 2011)

### 三

尽管有的语与字、词关系较近,有的稍远,但词、语是一体的,因为它们一般都可作为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多数都可入句而为句法所组织。将词、语分开,无异于将本属一体的语言词汇单位割裂开来,破坏了语言的整体性和科学性。词语是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语”尤指与词接近的成语、仿语、惯用语等。不但词、语不可分,还应该将字囊括进来,字、词、语才是一个整体。《现代汉语词典》的收条,就是以字打头,既收单字,又收复字的词,酌收由词和其他成分组合成的成语(如“风花雪月、得陇望蜀、刻舟求剑、唾面自干”)、仿语(如“拉丁字母、客观世界、勤工俭学、黑色火药”)、惯用语(如“拉家带口、拖儿带女、黑灯瞎火、可惜了儿的”),以及极个别的谚语(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歇后语(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等。将字、词、语(多是成语、仿语、惯用语)裒辑成一部词典,不但方便读者使用,也符合学理。这似乎是中外学界的通例,汉语的如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英语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日语的如三省堂的《国语辞典》《大辞林》、岩波书店的《广辞苑》,莫不如此,读者尽可查阅。单以词为收取对象的词典是有的,那就是专门性词典,如联绵词词典。单以语为收取对象而分门别类编纂出版,便于读者查阅,古已有之,如明·杨慎《古今谚》,清·杜文澜《古谚

谚》，现代更多，温氏自己就在将各类语合编成《古今俗语集成》之后，又将它们拆分开来，分编成《中国格言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中国谚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中国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等一系列“辞海版”大辞典，分编成《新华惯用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7）、《新华歇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8）、《新华格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6）等一系列“新华版”词典。当然，2014 年他又将谚语、成语、歇后语等语再次合在一起，编成《新华语典》（商务印书馆 2014），正紧锣密鼓编的还有《语海》等，那是后话。

一部词典性的工具书，可站在词的立场上，以字为基础，主收词，酌收语。《现代汉语词典》等语文词典就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这样做也是完全正确的。一部字典性的工具书，可站在字的立场上，主收字，酌收词。新华辞书社编的《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 1957）就主收字，同时兼收一些词，尤其是联绵词，例如“堂”字下辖“堂堂、堂皇”等词，“阑”字下辖“阑干、阑珊”等词。《新华字典》如此做，秉持的原则主要有二：（一）读者一卷在手，用途多多；（二）字和一些词的基本性质十分接近。一部收取语的工具书，也可站在语的立场上，主收语，酌收词，如清·王有光《吴下谚联》既收“吃白食、大鼻头、青黄不接、海外奇谈、钟馗捉小鬼、眼饥肚里饱、猪也糊木也糊、不知天地人和、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等，也收“吃醋、东西、爬灰、云雨”等。<sup>④</sup>温端政主编的《新华语典》如果只收谚语、歇后语、格言、名言，不收成语、仿语、惯用语，还罢了；现在该书既收谚语、歇后语、格言、名言，又收成语、惯用语等，令人对他的做法起疑：是否凡见到带“语”字的语便都搜罗到一起？现代人嘴里的“语”和古人（尤其是先秦时人）口中的“语”在内涵上不完全一致，这是常识，料温先生不会不知。把凡称“语”的语混编一起，认为都与词区别开来，词汇中的语被“语汇学”“语典学”统统拉走，词汇中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词，这大概就是温先生的目的。不过，我们建议温先生还是首先潜心研究一下他那个“语汇学”与“词汇学”区别何在，研究一下他那个“语典学”与“词典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再来说话，才是正事。学术研究不可不顾学理，随意标新立异。（刘静静 2016）否则，对学术风气的严肃性，有百害而无一利。

#### 四

对汉语的语进行研究，有很多工作值得我们倾力去做。除上述注音、释义、溯源、查证等工作外，将语放到文化史这一宏大的背景上对其进行复合型的研究，研究各类熟语语体之雅俗，研究雅俗词语彼此的交互影响，研究士大夫阶层对雅俗词汇单位的不同取态，研究中西学者对汉语雅俗词语的不同态度，等等，都是需要我们着力进行的工作，或都能取得不菲的研究成果。以下略申说如次，就教于方家：

俚言俗语为何在中古与近代衔接时期大量产生？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古与近代衔接时期产生的俚词俗语，有两类典型代表，一是歇后语，一是多为三字而被人称作“惯用语”的单位。<sup>⑤</sup>中国俗文学，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有充分的反映（郑振铎 2009），俗文学的载体相当一部分就是俚言俗语。唐宋以降的文言文虽大体以周汉文章为轨范，但词汇不可能将旧有的僻词废义悉数继承，也不可能不吸纳口语中的成分。（太田辰夫 1991）唐人创作的歇后诗是歇后语的先声，是歇后诗走向民间、进一步俗化的产物。产生歇后语的土壤，也催生出被后世一些学者称作“惯用语”的俚俗词语。这类俚俗词语，始见于唐·李义山的《杂纂》，如“不相称、怕人知、有智能、不可过”。明·陈士元《俚言解》也收有一定数量的三字词，例如“照胆清、二形子、小家子、老顽皮”。清·翟灏《通俗编》不仅是有清一代且是自唐至清千余

年间收条较为完备和科学的一部词语类工具书。《通俗编》所收的 5,558 条词语单位中有 696 条由三字构成,占全书收条的 12.5%,例如“不敢当、稽顙拜、下财礼、招魂幡”。中古与近代衔接时期俗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使得歇后语等俚词俗语成为了民间惯常使用的重要的语,随处可见,随口造出,风行于世,蔚为大观。

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如何看待俚言俗语?这又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汉语词汇的雅俗,在词汇还是单字词为主要的时代即已存在。统治者认可的字,是正统的字,该字所代表的就是雅词;后世造出的,特别是民间自造的字,是非正统的字,该字所代表的就是俗词。双字词自上古与中古之交大量产生,但在近代开始前,士人心目中具正统地位的语言词汇单位还是字,而不是由字与字合成的词或语。近代以降,复字词语如雨后春笋般生成,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主体。然而,这复字词,却被不少士大夫将其与单字词对立起来,视之为俗词语。三字俚俗词语多出现于唐,逮明清两朝,更涌现于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作为汉语词汇重要成员的三字词语,无论是当初还是如今,多宜表现俚俗的或并不典雅的内容;而作为成语最习见的形式,四字词语则多是汉语典雅词语的典型代表。谚语在先秦时代即已大量出现,历代续有增添,明清时已蔚然可观。然而,谚语可以转化为成语,条件是截长去短,使之在形式上符合或四字或八字的偶数音节的要求,否则便很难转化为典雅的成语,而永远是俚俗的谚语。俚俗的语言成分雅化的情况俯拾即是,典雅的语言成分俗化的情况却不多见。(周荐 2004)士大夫对俚言俗语的重视是后于社会大众的,他们重视的成果就是词语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工具书的编纂。唐·李义山《杂纂》,宋·无名氏《释常谈》,龚熙正、吴子良《续释常谈》,是两朝代表性的著作。逮明清,终于迎来了丰收季:明有陆嘘云《世事通考》、陈士元《俚言解》、郭子章《六语》等,清有钱大昕《恒言录》、陈鱣《恒言广证》、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梁章钜《称谓录》、郑珍《亲属记》、胡式钰《语窰》、高敬亨《正音撮要》,以及李光庭《乡言解颐》、王有光《吴下谚联》等,不烦尽举。(徐时仪 2016)明清学人对俚言俗语由不待见到热衷搜求,反映了时人对语言的态度的转变,而这种态度的转变又使我们今天有了了解当时社会语言词汇真实面貌的可能。

拿中国的士大夫与来华传教的西儒相比,两者谁更重视俚言俗语?这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本土学人对俚词俗语的态度,由鄙夷而轻视而重视,是经历了一段不短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的自觉,是促使他们觉醒并最终行动起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郑振铎在谈到文体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起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型式了,渐渐的这种新文体得了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的支持了。渐渐的这种的新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他们渐渐的远离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郑振铎 2009)郑振铎这里说的是文学的文体,语言的词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本土学人开始只认单个汉字中的一部分是典雅的语言成分,之后逐渐的,那些曾被他们认作俚俗的单位不再被认为俚俗,甚至进入典雅的行列中。学者亦然,开始几无学人措手研究俚俗的词语,但是久而久之,终于有人对其发生了兴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以此名世。如主动关注词语雅俗问题的易本娘,就凭一己之力完成了《常谭搜》。《常谭搜》首次勾画出词语的雅俗类别,功不可没。

中国学者关注俗语,似不如西方来华传教士那么积极和主动。(王铭宇、周荐 2016)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之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多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

但也有西儒编纂词典,不光关注词,也把目光投放到俗语上,注意汉语俗语的收集。如19世纪初叶来华的葡萄牙籍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salves, 1781~1841)撰有《汉字文法》(澳门圣若瑟修院1829)一书。该书专设第六章“俗语”,收357条。这357条“俗语”,从词长上看,四字的如“掩耳偷铃、对驴抚琴”,七字的如“羊毛出在羊身上、财帛分明大丈夫”,十字的如“事忙先上账,免得后思量”“世上无难事,只怕恒心人”,还有超过十字的单位,如“不要马儿食的好,倒要马儿行的好”“当家才知柴米贵,养儿方识父母恩”;从语型上看,有成语,如“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有谚语,如“大旱之后必有大雨、真金不怕火炼,好酒不怕人尝”,有惯用语,如“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儿去、嘴里说好话脚下使绊子”,也有歇后语,如“管弓的弓弯造箭的箭直——做什么事思何事”“阴天晒被褥——白搭”。357条“俗语”无一条是双字词、三字词,更无一条是单字词。这说明,在江沙维看来,俗语的词长与词的词长,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西儒看重汉语熟语,还表现在他们对四字语的研究热情上。比如17世纪中至18世纪初由无名氏耶稣会士编写,后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的汉外对照词汇集——《四字文笺注》,就很值得关注。该书胪列1,463条四字短语,并配以英语和法语解释。是书收入的都是四字语,其中有较为典雅的,如“谨当如教、谨领台命、整冠束带、君正臣贤”,也有较为俚俗的,如“安营下寨、进退两难、人喊马嘶、油嘴油舌”。(王铭宇2014)早在三四个世纪前,西人手稿中就出现了如此关注汉语四字语的词汇集,说明西人对汉语四字语的重视,也说明西方学人比本土学人更早将研究的目光投放到单字词之外的复字词语上。

以上所谈的雅俗问题,只是熟语研究中的零星问题。将汉语熟语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词汇学理论的指导下,潜心正业,务求本真,一定能为汉语熟语的研究做出真正的贡献。

## 附 注

①《现代汉语词典》从“试印本”到第7版给“语”的释义一以贯之,未尝改变,始终是“谚语;成语”。

②说到此,需提请读者注意如下事实:1985年,温氏在两书中只提“语汇”,未贸然提出“语汇学”,等待15年,见无人站出来指斥,便于2000年在《“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一文中正式推出他的“语汇学”。同样的,2002年温氏《论语词分立》首用“语典”的术语,未马上提出“语典学”,等待13年后,见无人站出来驳斥,便于2015年在《论新华语典的学术意义》中提出了他的“语典学”。

③其实,若论起“语典”这么一个双字组合体,倒还不是21世纪温端政的发明,早在20世纪上半叶,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论及有关王荆公用韩昌黎诗典之法,即提出“语典”“意典”“势典”之说;嗣后,钱先生“经常会比喻地说,‘字典’‘词典’之后,应该编辑‘语典’,而不应该编那些认为固化不变的《成语词典》,只应出‘语典’才和汉语相当”。(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钟书〈围城〉九段》第23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7年)当然,温端政后来的“语典”与钱先生当年的“语典”,自是风马牛不相及。

④当然,王有光《吴下谚联》所收条目是否稳妥,可以再议。但他将词语衰辑一处的做法值得重视。

⑤之所以说歇后语、被称作“惯用语”的词语是俚言俗语的典型代表,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是:古谚语有不少后世化为成语,歇后语、“惯用语”很少有化为成语的。

## 参考文献

- 胡明扬 1999 《说“词语”》,《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刘静静 2011 《也谈“语词分立”》,《辞书研究》第6期。  
刘静静 2016 《“语词分立”和“语典学”的立异》,《辞书研究》第1期。

- 〔日〕太田辰夫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 王铭宇 2014 《〈四字文笺注〉考辨》，《辞书研究》第2期。
- 王铭宇、周 荐 2016 《明末及清中叶中西文献所见汉语熟语》，《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温端政 2002 《论语词分立》，《辞书研究》第2期。
- 温端政 2015 《论新华语典的学术意义》，第五届语汇学会议论文。
- 温端政、沈慧云 2000 《“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语文研究》第4期。
- 徐时仪 2013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徐时仪 2015 《汉语白话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时仪 2016 《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张铁文 1999 《成语的数量及产生年代》，《语文建设》第5期。
- 周 荐 2004 《词汇学词典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 荐 2010 《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报》5月18日。
- 周 荐 2014 《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周 荐 2016 《词汇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 荐 2017 《术语创制与词汇学学科发展》，《汉语学报》第2期。
- 周 健 2007 《语块教学在培养汉语语感中的作用》，《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 荐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 汉语句法省略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汉语语法专题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主办的大型学术会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第九届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拟定于2018年10月中旬举行，讨论专题为：汉语句法省略。欢迎海内外学者参加。有意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请在2018年6月30日前提交会议论文提要电子版（WORD文档或PDF文档）给会议主办单位。论文提要字数限定1,000字左右，中英文不限，请在文末注明作者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匿名评审后，将在2018年8月30日前给通过评审的专家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论文提要请发到本次会议专用电子邮箱：[ccnu10yth@sina.com](mailto:ccnu10yth@sina.com)。

会议咨询电话：027-67865623。

（会议筹备组）